

乡村记忆

吃一回“松狗子蛹”有多难

于建亨/口述 刘甲凡/整理

松毛虫,又名火毛虫、毛毛虫,我们家乡人都管它叫“松狗子”,它结茧后化的蛹就叫做“松狗子蛹”,那可是吃过一回一辈子都忘不掉的美味。

松毛虫多为灰褐色,其周身遍布着密密麻麻的毒毛。当它结成茧子后,身上的毒毛仍保留在茧子表面,人的皮肤一旦触碰到,立马就会起一片红扑扑的大疙瘩,并伴随着灼痛和奇痒,和它打交道那可不是好玩的。

松毛虫的幼虫在松树皮里过冬,天气暖和后就爬出来啃噬松针长大。每年过了农历的六月六,松毛虫就陆续开始结茧化蛹了。前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,山里人都会为了吃上“松狗子蛹”忙碌一阵子。

用剪刀或镊子把松茧从树上扯下来,用牟平话来说就叫“铰松狗子蛹”。这是一项十分辛苦的营生,为了不使它的毒毛弄到身上,不管天气多么炎热,都要穿着厚厚的长袖衣裤,尤其是袖口处还要用布条扎起来。中伏天,进了幽深的山芥里,一丝风也没有,头顶上是火辣辣的太阳,又热又闷,那滋味可真是不好受。一旦遇上连阴雨天气,村里人简直就高兴坏了,一个个急溜溜地披上蓑衣或麻袋皮、戴着草帽往山上跑。下雨天不仅凉快,而且松茧被雨水淋湿了,它的毒毛就飘不起来了。

松茧铰回家,把“松狗子蛹”从松茧里取出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通常是把松茧拿到远离村口的空旷场地,用几块石头支起一个简易灶口,放上一块筛底状的大铁板,然后把松茧倒上去用木棍摊铺开。一切就绪,就在铁板下点燃麦秸草。旺旺的火苗从铁板的空洞冒上来,就把松茧的表皮烧糊了。这时候要用木棍不停地拨弄松茧,使其表面全部都被火烧遍。眼瞅着烧得差不多了,就用两根木棍把铁板端下来,把松茧倾倒在一旁的地上,然后再一次次重复上述的过程。

等把所有的松茧都烧燎结束,就用筷子把“松狗子蛹”一个个挑拣出来。拣的时候要双手各持一双筷子,左手的筷子压住烧糊的松茧壳,右手的筷子则负责把“松狗子蛹”拨出来,再撇进铺着牛腿瓜叶子的小篓里。

“松狗子蛹”都拾掇利索后,就用麦秸草把松茧壳焚烧干净,然后挖个坑把灰烬埋进土里。如果做不好这一步,村里人就会批评你不通情理,贻害他人。

“松狗子蛹”要拿到大河里冲洗干净。首先把盛着“松狗子蛹”的小篓在河水里使劲抖动,里面的杂质就随着滔滔的河水漂走了。接下来,还要用牛腿瓜叶子在“松狗子蛹”上反复搓擦,就把“松狗子蛹”上的毒毛吸附下来了。事前要准备好多牛腿瓜叶子,这样的搓擦要重复好多遍,搓擦得越仔细,“松狗子蛹”就越干净。

那时候没有胶皮手套,这每一步操作无论多么仔细,手上还是会粘上毒毛。记得妈妈每次忙活完这些营生,都是用稀释的碱水把双手浸泡一会儿,可还是会又痒又痛好多天。

最后一道程序就是炒“松狗子蛹”了。把“松狗子蛹”倒进大锅后,要添加适量的食盐,然后,一个人慢慢烧着麦秸草,连风箱也不拉,让火苗弱弱地“呼啦”着就行。看锅的人则要用锅铲子一刻不停地翻动着“松狗子蛹”,如果翻动不及时,最底层的“松狗子蛹”就要被炒糊了。随着锅铲子“哗啦哗啦”地在锅里翻动,一股浓郁的香味就慢慢在屋里弥漫开来。

“松狗子蛹”又嫩、又香、又鲜,实在是好吃得不得了,和柞蚕蛹比较起来,其味道更胜一筹。其中最好吃的是那些还没化成蛹的松毛虫,用剪刀沿着其脊背剪开一道口子,扒出里面白嫩嫩的肉,那种鲜美的滋味实在是形容不出来。

在我们村有个传统习惯,家家户户吃“松狗子蛹”这顿饭,都要煮一锅菜豆苞米面咸饭。吃着“松狗子蛹”喝着咸饭那是绝配,那种别具一格的好滋味,保证能让你吃个大肚溜圆、饱嗝连连。要是赶巧从山上拣回来一些新鲜的野蘑菇,洗净后切片添加到咸饭里面,这顿饭就会格外多了几分好滋味。

不过,吃“松狗子蛹”的时候一定要仔细,把每个“松狗子蛹”尾部的尖尖掐掉,因为那上面始终黏附着一点点毒毛。可即便再仔细,吃完饭还是会有点嗓子眼发痒、舌头根子发硬的感觉。就是因为这,我们家乡有这样一句常用俗语:“别光顾得‘松狗子蛹’好吃,有你舌头根子发硬的时候。”久而久之,这句话就衍生出了另一层意思:当某些人得意忘形时,就会有人借用这句话来怼他。

吃一回“松狗子蛹”太不容易了,我13岁那年的一段经历,更是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那是1964年的中伏天,姑姑从石家庄赶回来看望病重的奶奶。妈妈想铰点“松狗子蛹”给姑姑吃,可因诸多家务缠身,一直腾不出手来,就把这事交给了我。

那天一大早,我就带着小铁桶和剪刀上山了。在这之前,我也曾跟着妈妈干过这营生,可都是跟在妈妈身边,随时得到妈妈的指教和关照。这次自己单独行动,就有点力不从心了。那时我还没有1.6米高,而大多数松茧都在高高的松枝上。要把松茧扯下来,就要先跳着高把松枝扳弯,在这个过程中,就会有一些毒毛散落到身上。时间不长,我的手上、脸上、脖颈上就又痒又痛,真有点吃不消了。越是心烦意乱越容易出岔子,一不留神,一个从高处扯下的松茧一下子掉进了衣领里,我紧张地一抖搂,松茧顺着胸口滚了下来,胸脯上立马就起了一长串红扑扑的大疙瘩。

直到过了晌午好一会儿了,我才大汗淋漓地提着大半铁桶松茧回家了。当我脱了衣服露出被毒毛蜇起的一片片红疙瘩,姑姑抚摸着我的,难过地掉下了眼泪,硬是塞给我两元钱。

后来,开始用飞机撒药防治松毛虫,“松狗子”慢慢地就绝迹了。时至今日,“松狗子蛹”想吃也没有了,只留下这些故事。

往事如昨

老冰棍的味道

姜德照

今年的夏天感觉比往年格外热,久违的雪糕也开始吃了起来,我经常到商场批发一些放到冰箱中。每次拿回家,都是儿子接过去,放进冰箱的冰冻抽屉中。在放之前,他翻看了我买的雪糕,对我买的那些六七元钱一根的雪糕,说一声:不错。妻子去商场回来,说那里的雪糕太贵了,四五元一根,我和儿子相视一笑,也不解释。

我和妻子小时候吃的都是冰棍,那时候冰棍的外包装纸上写着“老冰棍”三个字,与现在那些千奇百怪的高档雪糕截然不同。“老冰棍”的价格很亲民,今天的孩子和年轻人不会去问津“老冰棍”,“老冰棍”代表着那个早已远去的年代。

我们这些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,小时候的夏天,能吃上冰棍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。那时的农村,偶然才有走街串巷的商贩推着自行车,车后面驮着一个上面蒙盖着棉被的箱子,嘴里吆喝着:卖冰棍来——孩子们看见了,就跑回家,和爸爸妈妈要零花钱去买上一支,那时候的冰棍也不贵,几分钱一支。到了卖冰棍的人面前,他会掀开箱子上面的棉被,打开箱子,取出一支,然后赶紧把箱子关紧,把棉被重新包裹上,这箱子就是那个时代简易的保温箱。孩子们买到冰棍,立刻揭开冰棍纸一扔,伸到嘴里咂摸起来,脸上满是笑容。

我最难忘的一支冰棍,还是7岁那年的夏天,在烟台机床附件厂上班

的伯父买的。那天傍晚下班后,伯父带我到工厂食堂吃完饭,然后用自行车驮着我,到老烟台的南山路,在那附近的一家书店买回一些书。一出书店门,我突然看到马路旁一位老奶奶坐着小板凳在卖冰棍,城市人卖冰棍与那些在农村吆喝的人不一样,不是那种大箱子,而是用一种比较粗的暖瓶,里面装着冰棍,每卖出一支,还会剥开冰棍纸,放在脚下的方便袋中。见我被冰棍吸引住了,伯父就停下自行车,给我买了一支,那是二分五的冰棍,他自己竟没舍得买。那支冰棍的味道我至今难忘,一放到嘴里,先是一阵凉爽充满全身,而后是那种甜甜的味道。我不舍得大口大口吃,而是一次次放到嘴里用舌头舔,直到冰棍快融化了,才完全吃到嘴里。那一次,我不舍得马上丢掉冰棍的木柄,在嘴里咂摸了好久上面的甜味。

有一年,伯母领我去大连的舅舅家,在那里我第一次坐上了电车,伯母还给我买了一支冰棍。那可是大冬天,大连的冰棍味道与以前在烟台吃的不一样,像是用老桃酥水做的,一口老桃酥味,而且在那么冷的冬天,一点也不感觉凉,因此我对那特殊味道的冰棍一直难以忘怀。

“老冰棍”承载着一个久远时代的回忆,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,还是习惯偶尔买上一支“老冰棍”,在咂摸中回味那曾经的岁月和那些永不消逝的记忆。

从叛徒“马家辉”说起

杨文草

85岁的妈妈在电视上看老电影《党的女儿》,看到剧中的叛徒马家辉,顿时来了兴致,给我讲起两件她当年亲历的趣事。

妈妈20多岁的时候,在海边的一所村小学里教二年级。一天下课后,两名男孩子在教室里不知为何打起来了,同学们拉都拉不开,班长跑着去办公室把妈妈找来了。妈妈来到教室,这两名男孩还在用语言互相攻击对方。个高的小明骂个矮的小强叫“马家辉”,小强就骂小明“花花烟袋杆”。两名男孩的互相叫骂,让妈妈和所有同学听了都一头雾水。

妈妈把这两名男孩叫到办公室,问他俩为何这样称呼对方。小明说,他们两个人本来是好朋友,在两个人好的时候,告诉了对方自己的一个小秘密,并承诺不和任何人说。今天两个人为一点小事闹掰了,所以秘密也就不是秘密了。

妈妈问小明为何称小强是“马家辉”,小强的名字也不叫“马家辉”呀。小明说小强经常爱打同学的小

报告,有人背后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“马家辉”,就是电影《党的女儿》中的叛徒。妈妈又问小强,你又为什么叫小明“花花烟袋杆”呢?小强说小明家有四个哥哥,没有闺女,他妈又稀罕闺女,从小把小明当闺女养,给他穿花衣裳,但是他又是男孩,所以有了外号“花花烟袋杆”。

在妈妈的教育下,两名男孩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和好如初,但是“马家辉”和“花花烟袋杆”的事,当时被当作趣事传开了,如今我听了也禁不住笑了起来。

妈妈见我高兴,又讲了另一件趣事。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,物资匮乏,妈妈的邻居是一对老农民夫妻。一次老两口收到儿子寄来的一封信,上面写着:“爹同志娘同志,爷爷奶奶老同志。社会主义一枝花,各人挣钱各人花。”当时,老两口看了非常生气,认为儿子这是不孝,当即回信说:“儿同志娘同志,孙子孙女小同志。社会主义就是好,养老钱一个也少不了。”听了这个故事,同样让我忍俊不禁,笑出了声。

